

# 从突破封锁线到进军台湾

俞光

瑞安轮船业自晚清诞生后,在民国前、中期获得顺利发展。抗战前后,瑞安轮船业经历了大落大起的曲折发展过程。



如今的飞云江渡轮

## 抗战前顺利发展

在内河运输方面,除了原有的温瑞航线外,民国15年(1926),开辟瑞安内河客轮航线。次年,又辟瑞安城关至平阳抗航线。至17年,温瑞客拖轮增至8艘。19年,辟瑞安城关至岩头航线。21年,瑞安通济轮船公司的温瑞河轮与飞云江渡轮衔接后,飞云江南岸内河航线延伸到平阳,再由平阳县城到鳌江。在温瑞航线上,除通济轮船公司外,又有安平、通利两轮船公司互相竞争,乃由该三公司协商,规定班期与轮次,竞争始告平息。26年,通济、安平、通利等3家内河轮船公司经营温瑞、瑞平、飞云江干线客运,先后投入营运的轮船10多艘,拖驳20多艘。温瑞航线每天客轮对开8次,客运量约3000人。民国24年至34年温瑞轮船票价:盘舱每客3角6分,拖船每客2角5分。温州、瑞安、平阳、鳌江客轮联运,平阳坑、岩头航线每天随潮往返2次。此外,飞云江航线上还有县城至塘头、周村、仙降、江浦、马屿、潘岱、澄头、塔山、陶山、沙垟等埠的民船客运航班。

在沿海运输方面,民国10年(1921),定海达兴轮船公司“三江”、“福兴”两轮先后航行定海至瑞安线,货运由同盛商行代理。民国13年,浙江轮船公司400吨位“德利”轮抵瑞安营运,货运由永太船务行代理。民国16年,曹筱卿与台州人等合资组织沪兴轮船股份有限公司,股金3万元,曹筱卿为董事兼副经理,股权占三分之一。购置300吨级的客货轮1艘,取名“瑞平”,行驶于上海—玉环楚门—瑞安—鳌江之间,10天为一航次。民国19年又购置350吨级的客货轮1艘,取名“新瑞平”,行驶同一航线。此航线的开通深受各界欢迎,对当时瑞安的对外交通和农工商各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。民国22年,县商会组织统一船务行,除营报关业务外,并备运输工具办理运输。民国23年,曹筱卿、雨人、勉夫三兄弟与姜筱卿、钟芷山等集资成立瑞安商轮公司,买了一艘载重量为781吨的客货轮,命名“新瑞安”。民国24年,几家轮船公司合并为瑞安商轮公司,经

营瑞沪航线上客货运,有6艘客货轮行驶,每月有18个航次,月平均货运量约5000余吨,客运量约3600人,出现了民国时期瑞安航运业最繁忙的景象。

民国25年,全县进出口(特指进出瑞安港,而不是通常所讲的进出国内外)总额415万元,其中从上海、宁波、厦门等地,进口豆饼、面粉、香烟、布匹、花纱、南北货、煤油、大豆、鱼类、洋广货、药材等计217万元;出口上海、福建等地薯丝、木炭、土红糖、笋菜、笋、菜油、土纸、茶叶、酒、炼乳、烟叶、木板等计198万元。次年,全县进出口总额535万元,其中进口豆饼、花纱、南北货、煤油、鱼类、面粉、香烟、布匹、洋广货、杂货等计277万元;出口上海、福建等地杂粮、板炭、土红糖、炼乳、土纸、茶叶、烟叶、菜籽菜油、酒、笋菜、香烟、鱼类、杂货等计258万元。全县进出口总额、进口额、出口额分别比上年增长28.9%、27.6%和30.3%,不仅各项指标全面大幅增长,而且入超减少,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。

## 突破胜利日军海上封锁线

抗战爆发后,日军的侵略使瑞安航运业遭受重创。1937年上海“八一三”事变,“瑞平”、“新瑞平”、“三江”、“福兴”、“德利”等五轮和所有停泊在上海港口的其他轮船一起奉命沉在黄浦江中,封锁航道,仅“新瑞安”正行驶于从上海至瑞安途中,才幸免于难。

抗战期间,瑞安航运界为突破日军海上封锁而顽强斗争。其时我国广大地区相继沦陷,沿海重要港口城市均被日军侵占。1937年8月25日,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官谷川宣布,对我国上海至汕头的沿海实行封锁,禁止中国船舶航

行。9月5日,日军将封锁区扩大到北至秦皇岛,南迄北海,同时还封锁了长江航道。于是,我国沿海通往大后方的运输大动脉均被日军切断。为了突破封锁,瑞安航运界进行了顽强斗争。

当时我方军事上处于劣势,制空权、制海权均掌握在日军手里,要突破封锁,智取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。由于日方对第三国“和平贸易”不加干涉,1938年春,在国民政府的默许下,温州航商借用第三国的名义进行运输。他们与外国驻沪领事馆挂钩,改变船名,雇佣外籍船长,悬挂外国旗帜,从上海

装货运往温州,取得了成功。同年4月27日,瑞安商轮公司的新瑞安轮与德商鲁麟洋行签订协议,把船舶所有权转入德籍,易名飞康轮。5月间,轮船挂上德旗,配备德籍船长,由瑞安驶至温州补充了燃料和其他急需物料,装好客货首航上海获得成功。此后飞康轮成为瑞平地区唯一尚在航行的轮船,为抗战前期瑞平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。1940年,日军封锁加紧,飞康轮改航于温州、象山、石浦、宁波等港口。直至1941年,因日军海上封锁,飞康轮等轮亦被迫停航。

## 抗战胜利后进军台湾

抗战胜利后,瑞安航运业得以新生。瑞安内河运输除了原有的航线外,1945年冬,温州、塘下、莘塍等地航商先后创办“公平”、“大有”、“泰利”、“来安”等轮船公司,增辟梅头、鲍田、丽岙、塘下、莘塍、九里至温州的6条航线,加强了温瑞

之间的经济往来。沿海运输方面,新瑞安轮恢复原名,往返上海至温州航线,后又改航上海至福州航线。1945年11月至1947年底,瑞安航运界先后添置商轮,发展对台湾的航运。当时开往台湾基隆、花莲等港的有“东平”、“小瑞安”、“通

安”、“兴南”、“东山”5轮,共计700吨位,585马力,运往台湾、福州、香港的物资有生猪、水产品、黄酒、制牛皮、木炭、屏纸、茶叶、笋菜等,运回瑞安的物资有白糖、洋枋(染料)、旧机器配件、水果等,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。

## 任道逊留碑悟空寺

林成植

### 任道逊书《寿碣》

《悟空禅寺重建纪念碑》记:“明成化间,任道逊为镜堂法师书《寿碣》。”

任道逊(1422—1503),瑞邑名人,居邑城西岷山下,有一诗《岷西村庄》:“半亩新居置岷西,到城门外是江堤。潮声入夜月当午,山色载春花满蹊。棋局几番双鬓改,酒杯载覆一莺啼。村庄别有闲趣画,种竹栽松与灌畦。”

清嘉庆《瑞安志》载:任道逊“七岁工书,永乐中,以奇童荐。历官太常卿,弘治初致仕。资性敏捷,仪度端庄,博通经籍子史。冲淡乐易,号坦然子,居官五十余年,囊橐萧然,以诗文自娱,更号八道人。居别墅,与同邑通判吴祚、寺副蔡鼎结‘清乐会’,唱和吟咏。年逾八十卒,葬焦石山。所著有《太极心性二图并说集》、《云山樵语录》、《感兴诗》、《竹亭稿》、《归田百咏》等行于世。”

镜堂讲师是什么人,任道逊为什么为之亲书“寿碣”呢?《寿碣》开头说,镜堂讲师是当时很有影响的高僧,任瑞安僧会一职。吏部郎中钟景清是他的同学,景清的兄长景延是悟空寺的檀越主。所以出面请任道逊为之书碣。

钟景清(1419—1485),单名“清”,景清是他的字,世居本邑鹿岩。清少颖悟,深受何文渊喜爱。明景泰元年(1450)中举人,次年成进士。为官清正廉洁,自吏部郎中升至右布政使之职。明宪宗成化十四年,太监汪直用事,其党羽吏部尚书尹旻排斥异己,景清请退。回乡后,自号鹿岩居叟,与朋友立真乐会,吟唱徜徉山水泉石间。

《寿碣》记,镜堂名智玠,

“世本沧州儒家子”。明永乐丁酉年(1417)出生。“自幼警敏不凡,稍长,祝发于悟空用周上人。”故得到当时悟空寺的住持用周上人性全大师的器重。“意衣钵之,传有在,授以外外寺。”镜堂则“惟日孜孜不少懈……日相熏濡而所学益进。”于是,性全大师把悟空寺的住持交给他,“领割住持山门”。

后来,性全大师年岁渐高,要把自己担任了十五年的僧会一职交给镜堂讲师。“翁老,倦于勤,有荐以代辞,不就会。”还认为僧会一职“非镜堂莫宜”,“请为振锡北上”。对此重任,镜堂讲师一再推辞,经相劝,终肯接受。于是在天顺改元(1457)“赴京拜僧会职,时年三十有九”,应验了他伯祖“汝有不凡子,乏以亢吾宗承学,奈方外人年近四十当见子为沙门”的预言。

镜堂讲师是位诗僧,《寿碣》云:“瑕则与□□绅士游,诗篇唱和,有唐人风韵。”“礼部尚书胡公澐得所献诗,甚加矜赏。既而撤堂说法。”胡澐,字源初,武进人。明建文帝进士,授兵科给事中,历礼部尚书加少傅。节俭宽和,历事三朝。荐何文渊宜大用,乃擢刑部右侍郎。镜堂讲师的诗能让胡澐“甚加矜赏”,足见镜堂的不凡诗才。

任道逊,瑞邑书法名家,得以他的亲书《寿碣》十分难得,留到现在的更是少之又少。《瑞安市志·人物》任道逊条记:“罗凤镇沙淡村龟山腰有道逊所书之任氏墓志碑文,为其晚年精品。”任道逊与镜堂讲师年龄相仿,这块至今还嵌存在悟空寺的《寿碣》应是他又一晚年精品,十分珍贵。

## 悟空寺悠久历史

民国《瑞安县志稿》载:“悟空寺,在囫坑,原称院,石晋开运三年建院造塔,宋祥符间赐额。”

石晋开运三年,即公元946年,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。在这一千多年的历史中,虽无连续文字记载,但从这《寿碣》可知,明朝时的悟空寺十分繁荣,有性全大师、镜堂讲师为之住持。在镜堂讲师任住持期间,“树法幢,振宗风,皈依者咸得沾溉而鼓舞。”“藩臬大臣按部貌礼,不以属官遇之。”甚受敬重。寿终时又有“同师弟智渊一人,手度弟子永口等几十人,徒孙善密等十五人”帮忙作碣。可见镜堂讲师在当时瑞安佛教界的影响力之大。换言之,当时的悟空寺实为瑞安佛教中心,处于领导地位。

到了清康熙朝,悟空寺得以再次中兴。那里有两块收藏在寺院里的高僧墓碑。一碑

志:“皇清康熙五十七年(1718)山住持中兴比丘日净袒禅师之墓岁次戊戌仲冬月吉旦”;另一碑写:“光绪二十年(1894)春月立传临济四十二世圆寂师父超宗公觉之墓”。一块墓碑告诉我们,在康熙五十七年(1718),日净袒禅师率众僧将寺院中兴;另一墓碑记下了悟空寺传承的是中国佛教的南宗正脉——临济宗。在一千多年的传承历史中形成其特色的寺院文化。山门内楹联云:“福地绕祥云七宝瑞严传妙谛,秀林融瑞气万方馥郁现真如”。

至民国时期,寺院渐渐破落,至二十世纪六、七十年代寺院移作他用,后改作地方敬老院,屋舍破烂不堪,古寺名存实亡。改革开放后,百废俱兴。2006年,85岁高龄的释若进法师和青年法师释征行来寺住持,率众拆旧建新,经8年兴造,今在仙降街道垟坑村建成一座清静的寺院。